



对全球 韧性的 再思考

新冠疫情之下，各国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唯一的出路是国际合作

伊恩·戈尔丁

一名感染乘客从武汉飞往米兰，一种计算机病毒侵入互联网系统，一场源于美国中西部的次贷违约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机场枢纽、光纤电缆、全球金融中心——这些极大普及全球化益处的传播中介，同时也使各种问题广为扩散。这就是全球化的“负蝴蝶效应”，是我们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所特有的系统性风险，在这个世界里，发生在某个地方的十分微小的事件可以迅速蔓延，并最终影响全球。

我的书《负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Defect) 揭示了为何全球化会产生系统性风险，也讨论了为何终止全球化并不会阻断全球威胁，反而会加剧和放大它们。世上没有一堵墙高到足以阻挡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其他灾难性的风险。但国与国之间的高墙会降低我们合作的可能性，削弱我们对人类共同风险的管理能力。保护主义阻碍了能创造就业、提高收入的投资、贸易、旅游和技术进步，削弱了各国提升韧性的能力。这一切问题的出路在于全球合作，让全球化变得安全和可持续，而不是相互对抗。

当今世界需要优秀的领导力来管理全球化消极的一面，并收获其积极的一面，从而确保全球化的进步不会被共同的威胁所压倒和吞噬。对于一个拥有良好韧性的系统而言，其总体强度如何，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阻止下一场可能比新冠疫情危机更严重的疫情，必须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首要任务。这需要加强和改革世界卫生组织，使其拥有必要的治理、人力和能力，从而成为应对全球卫生问题的快速反应力量。

近几十年来，全球化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其发展速度大大超出各种机构缓慢演变的速度；我们的各种系统日益复杂，但我们对其的风险管理方法却并未取得相应进步，二者之间的差距甚至日益扩大。正如我们在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新冠疫情危机中所看到的那样，系统性风险可能会迅速压倒此前看似稳健的进程。这场疫情造成的威胁固然毋庸置疑，但气候变化造成的缓慢但却不断累积的危险也同样需要各国协调一致，共同采取行动。

此次疫情凸显了我们对自然威胁缺乏免疫力，但它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调整经济的机会。我们看

到很多关于绿色刺激政策的提议，它们提供了一种可能，让我们有望更好地重建经济并加速完成从化石燃料向新能源的转变。从气候抗议到种族示威游行，全球范围内的抗议活动显示了人们对新思维的渴望。新冠疫情危机也表明，在必要时人们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剩下的就是由各国政府来采取行动了。

需要网络化的解决方案

新冠疫情危机表明，国际社会亟须提高全球风险管理能力。此外，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和先前的金融危机也都提醒着我们这一点。我们亟须改革，以驯服全球化的负蝴蝶效应。

这些网络化的威胁要求我们必须对系统的所有部分都做出改变。要想真正行动起来，就必须从改变个人行为做起——例如，戴上口罩，逐渐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韧性不能委托给别人，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企业应将审慎水平的闲置营运资金视为一项对韧性的宝贵投资，而不应为了尽量加杠杆而将其作为冗余砍掉。通过“准时制”生产(just-in-time)或精益管理系统最大限度减少资本或闲置产能的做法可能削弱韧性。近些年，从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爆发、日本东北地区海啸、卡特里娜飓风到玛丽亚飓风，再到当前的新冠疫情，各种灾难接连不断，监管机构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这样一点，即过于普遍的精简实践会让系统变得脆弱。

我们的金融、数字、贸易以及其他系统通过各种复杂的网络交织在一起。其中的交叉节点和枢纽全部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点，比如全球金融中心、主要的港口和机场等。将物流或其他节点集中在同一个位置会使它们经受不起冲击，将重要人员和信息集中在总部大楼的做法同样如此。提高地域多样化有利于增强韧性，但人们尚未将此纳入竞争政策或风险管理战略中。

越来越多具有前瞻性的公司股东和经理人表达了对于提高公司抵御系统性冲击的能力的愿望。政治家们同样热衷于增强公共部门的韧性。这一点固然值

得欢迎，但这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包括确定韧性应有多大，应能经受住何种冲击；企业和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或其他资源来保护自己免受所有可能的冲击。

权力下放有助于提高韧性，因为它可以使个人、企业和国家有权自主决策。但是，权力下放只能作为对更高层权力的一种补充，而非替代。对于风险管理和全球系统性风险来说，总体性原则是必要的。这就要求各国给予超国家机构一定的自主权。在这次新冠疫情危机中，无论是相对贫穷的国家（比如越南），还是较为富裕的国家（比如加拿大），所有严格遵循了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方针的国家表现都较为令人满意。各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上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从多个层面上控制风险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我们需要在国际、全国、区域、地方等不同层面上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多边机构应处于这种分层级的组织体系的顶端。然而，仍有一系列“孤儿问题”缺少相应的机构负责。一些国际机构能提供气候变化相关的分析和信息，例如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但没有一个拥有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全球机构来协调应对措施。我们也没有一个主要的全球性组织来打击网络犯罪活动，以前，甚至仅仅是单独一个计算机病毒，如 WannaCry 或 NotPetya（无论其系由有组织的国家机构还是独狼式的个人所开发），也能全球传播并在数天内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种威胁，就像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通过假新闻颠覆民主或阻碍疫苗接种运动一样，是以机会主义的方式通过全球化的数字网络传播的。这些威胁和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恐怖主义等威胁一样，也都超越了国家边界，但目前的应对措施主要是在国家层面展开的（对于欧盟则是区域层面）。

帕累托原理认为，80% 的结果来自 20% 的成因。这个原理仍然可以帮我们实现重大改变，因为少数行动者往往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那些主要导致问题出现的国家负有最大的责任去解决它们。在气候问题方面，少数国家和企业的总体碳排放量远远高出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仅纽约州地的碳排放量就超过了 45 个非洲国家，其所消耗的抗生素也超过了所有这

些国家的总和。正如“牛津马丁为后代委员会”的报告《着眼长远》(Now for the Long Term) 所言，由全球最大的国家、企业和城市组成的 C20-C30-C40 伙伴关系将涵盖足够多的重要参与者，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为解决臭氧消耗或扭转艾滋病蔓延成立的联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令人鼓舞；它让我们看到，只要坚定决心，由民众、企业和国家组成的联盟完全能够有所作为，对联合国和多边机构的事业提供支持。

21 世纪的全球治理

多边机构的成效如何，取决于其所有人的授权。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IMF 简化了工作流程，为成员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并非所有机构都能应对这一挑战，发展中经济体仍然迫切需要更多的多边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本应是全球卫生领域的快速反应力量，但其在最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却遭到了削弱。与此同时，尽管全球贸易亟待提振，但贸易战以及急需的人员任命和机构改革受阻，使世界贸易组织的效力遭到削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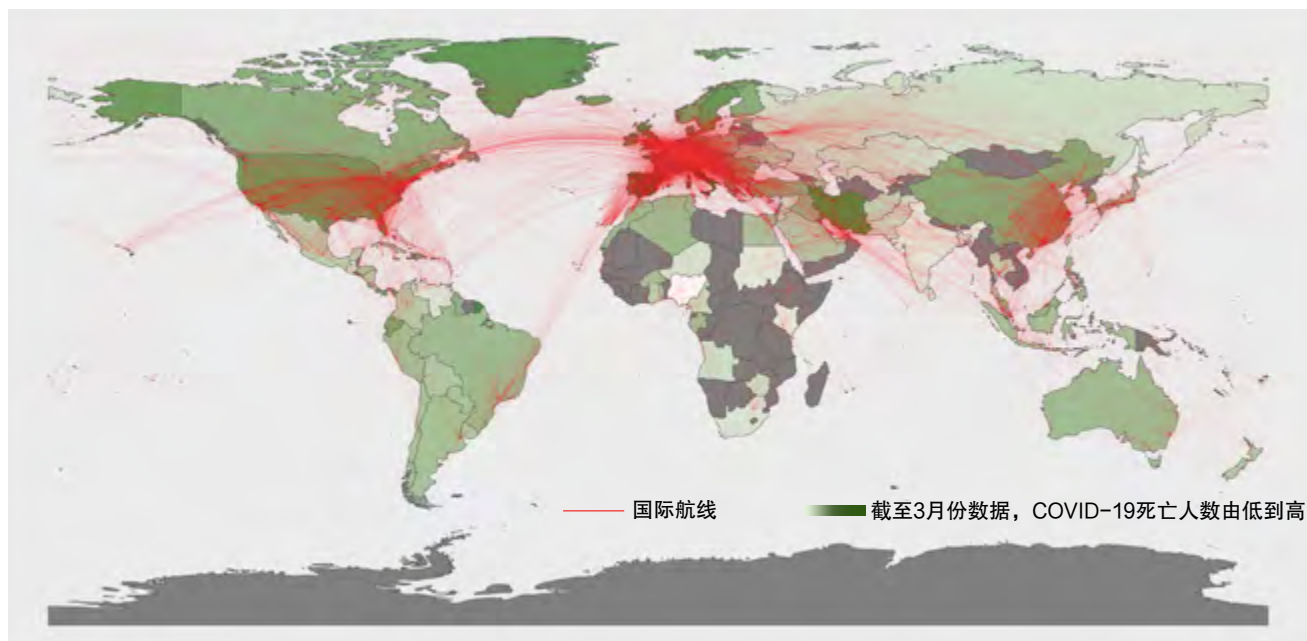
以中国为中心的机构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中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构成“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系列双边协议。与这些机构合作而非对抗才是明智之举，因为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尽可能多的支持，也需要对更多方面进行协调。提高人员的多样性也能提升效力和机构的合法性，广泛的参与能够为世界提供力量，而不是制造焦虑。

除了需要接纳新势力的崛起和更多样化的政府观点外，私人企业的作用与日俱增，也应纳入全球架构。AWS 云服务和谷歌云目前已成为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而亚马逊 Marketplace 则在商业领域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脸书已成为公共卫生信息的主要发布系统，阿里巴巴则成为个人防护装备的主要供销平台；在基于应用程序的人员追踪方面，苹果和谷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头羊。

和过去一样，下一场危机同样不会遵循我们的

航空公司与新冠疫情

国际航班助长了病毒最初的传播。



资料来源：死亡数据来自“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航班数据来自OpenFlights.org。

旧有思维模式；要想成功应对，我们必须与了解新形势的相关方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但是，私人部门并不总是只有好的一面，我们需要独立的监管机构来管控超级明星公司不断崛起的势力。我们还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专项技能，金融危机正是由于专家和监管机构未能真正理解当时的信用衍生品而发生；面对新的威胁时，我们不可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四大“元骑士”

全球机构改革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们可以和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作斗争（过去我们也一直这么做），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抗四大“元骑士”：短期主义、民族主义、成本和俘虏。选民可以阻止政府采取长期行动，并可能支持保护主义政策，而政府本身则由于财力有限，认为有必要优先考虑当下的紧迫问题，而不是那些虽至关重要但仍未发生的问题。

新冠疫情表明，只要有意志，所有四名“元骑士”都可以被战胜。政治家的注意力范围有限，更多关注当下的问题，但受新冠疫情影响的选民们将需要长期的解决方案。美国、英国、俄罗斯、巴西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由于对疫情应对不力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选民不会原谅政府不做准备，重蹈覆辙。历史也不会原谅未能阻止灾难性气候变化的一代领导人。正如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缔造新世界秩序的令人鼓舞的领袖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挑战是可能的。全球性机构和私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需要有同样的作为。

新冠疫情造成的卫生和经济紧急状况表明，全球各国需要协调努力。为了防止疫情出现反复，各国需要在疫苗研发开展国际合作。为了解决熟练医护人员的长期短缺问题，我们需要接纳移民。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防范新一轮金融危机以及战胜贫困，我们必须坚持推进全球化，在充分发挥其效益的同时坚

下一场危机不会遵循我们的旧有思维模式；要想成功应对，我们必须与了解新形势的相关方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

决弥补其缺陷，尤其是与系统性风险有关的“负蝴蝶效应”。

高收入国家拥有资源——政府和选民只需要对优先事项进行调整就够了。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平均将 6% 的开支用于军事，但用于预防大流行病的开支还不到这一数字的百分之一，尽管大流行病对社会的威胁远远大于战争。在国际层面上，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甚至比不上美国的一些大型医院。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各种资源在短时间内即被源源不断地调动起来，这说明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是可以找到资源的。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和发展这些经验。

金融危机凸显了群体思维和监管机构被游说集团所左右可能造成的风险。我们需要确保猎场看守人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独立性来阻止日益敏捷且拥有充足资源的偷猎者，这对保障系统的韧性至关重要。

惰性阻碍着制度改革。要想确保一个组织在治理、人员和业务等方面反映未来而非过去的需求，就必须将改革措施落实到位，使组织摆脱既得利益者的控制。但现实中，制度中到处充斥着未得到实施的善意改革。

进步是可能的，许多机构进行的根本性变革就证明了这一点。欧洲煤钢共同体曾经只是一个有限技术组织，后来发展成为欧洲联盟，并承担起十分广泛的国家责任。危机也可以是催化剂。联合国、IMF、世界银行、马歇尔计划和福利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锻造出来的。近几个月来，IMF 以创纪录的速度批准了创纪录数量的贷款，附带的条件也更少，同时其工作人员也正进行远程办公。各国政府抛

弃了旧有的规则，为劳动者和企业提供直接支持。许多曾经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做到了。

新冠疫情造成的破坏迫使我们加倍努力，去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更加包容的世界。这要求我们设法解决那些危及我们的生命并加剧不平等、贫困和气候变化的种种威胁。建设一个有韧性和可持续的未来需要我们所有人行动起来，从个人到全球都是如此。不仅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重要，民间团体、企业以及专业人士的合作也至关重要。我们这个时代的网络化问题可以通过网络化的方案得以解决。我们必须利用这场危机，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内建立更牢固的全新纽带。 **FD**

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是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教授，BBC 系列节目《改变世界的大流行》的主持人，也是《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的合著者。亚历克斯·科普斯泰克（Alex Copestake）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协助。

参考文献：

- Goldin, Ian. 2018. *Developmen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and Mike Mariathan. 2014. *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ldin, Ian, and Robert Muggah. 2020. *Terra Incognita: 100 Maps to Survive the Next 100 Years*. London: Penguin.
- Hepburn, Cameron, Brian O'Callaghan, Nicholas Stern, Joseph Stiglitz, and Dimitri Zenghelis. 2020. "Will COVID-19 Fiscal Recovery Packages Accelerate or Retard Progress on Climate Chang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6 (51).
- Oxford Martin Commiss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2013. "Now for the Long Term." Oxford.